

内部资料

青島工人运动简史

张云汉 张伯灾编

青島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印

说 明

《青岛工人运动简史》，写的是解放前青岛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主要史实。它是根据革命老干部和老工人的回忆以及有关的革命资料编写而成的。

这个资料曾在《社会科学动态》上连载过，现在应同志们的要求，把它收集一起付印，供有关方面参考。由于我们编写水平不高，在观点上可能存有某些错误；同时，由于搜集资料还不够广泛深入，个别事实难免有某些出入，因此，希望了解青岛工运情况的同志提供资料，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图 一

1925年2月，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图 二

1925年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



图 三

1930年9月，青岛大美烟草公司工人和美国资本家进行说理斗争。



图 四

1943年春，五号码头煤盐工人反日斗争。

（一）1922年12月中国收回青岛

青岛——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个风景秀丽的城市，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南端，南临黄海，扼胶州湾的咽喉，港阔水深，终年不冻，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水陆交通颇为发达，背后有气势雄伟的崂山作为天然屏障，又处于我国东面边疆的要冲，位置极为险要，因而形成一个天然的重要港口。

八十多年前，青岛原是一个三百余户的渔村。清朝末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青岛首为德国帝国主义所垂涎。“1896年，德人黎希特霍芬奉德政府命令来华，游历山东内地，于矿山物产调查甚详，盛为称誉……”^①1896年8月，德国政府又命其东洋舰队司令狄尔匹兹，调查胶州湾和山东半岛的军事形势与经济情况，认定胶州湾为最适宜的港口，其优点有四：1、适宜于停泊；2、建造需费不多；3、附近有煤田之利；4、气候适于欧洲人。

1897年，德国传教士在曹州巨野县强占民田，包揽词讼，鱼肉乡民，作恶多端，激起人民的愤怒。同年11月1日（清光绪23年10月7日）德籍传教士二人被当地人民杀死，教堂被毁。德寇竟以此为借口，于同年11月13日派遣海军占领青岛，强租胶州湾，并于1898年3月6日（清光绪24年2月14日）与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借条约》。德帝国主义侵占青

注①：洛洋、徐连城、刘亦冰整理：《巨野教案》。《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4期。

岛后，即着手修筑码头、铁路，建设炮台、兵营，划分住宅、商业、工业等区，开办教堂、学校、医院等，进行经济及文化侵略。经过十六年的经营，用中国人的血汗，使青岛由一渔村，逐渐变为城市。

1914年7月欧战爆发，同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9月3日，日寇30,000人由龙口登陆，分三路进兵会攻青岛，11月7日攻陷。从此，青岛又为日寇所攫取。1919年1月18日北京政府以参战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要求青岛——山东权利应由德国直接交还中国，并指出日本根本无权插手，但因英、美、法等列强纵容日本，牺牲中国，结果归于失败。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不顾中国代表的抗议，竟擅自主张把德国过去在青岛——山东的权利让给日本。这一消息传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高呼：“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誓死收回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凡尔赛和约！”等口号，表示反对。接着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雄伟的人民力量迫使反动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直至1921年11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又提出了收回青岛——山东权利的要求；经过频繁的协商，据理力争，日本政府才被迫与中国直接谈判，议妥后于1922年2月4日在《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上签字。前后纠缠了整整八年的青岛——山东问题，才算初步得到解决。

1922年12月10日，中国终于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了青岛。从此，青岛归北洋军阀政府管辖了。

（二）青岛工人阶级的成长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帝国主义强盗们纷纷闯进中国，他们依靠着特权和武力，大量倾销商品，廉价掠夺中国的原料，一时洋货充斥市场，白银大量外流，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摧残了中国的民族手工业。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伴随帝国主义在华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就产生了中国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

德帝国主义占领青岛后，经营不遗余力，于1898年4月就开始了筑港工程以及发电厂、水道局、电话局等建设。1899年9月开始修建胶济铁路，1901年至1906年又相继建立了四方机厂、电汽厂、缫丝场、汽水厂、蛋厂、窑厂等，于是就产生了青岛现代的产业工人阶级。那些跑到城市里来“活命”的破产农民和一部分城市游民无产者，就是青岛产业工人阶级的前身。他们都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苦大众，靠出卖劳动力糊口谋生，受着德国人和封建把头的鞭打脚踢，一天干着12小时以上的奴隶劳动。在这个过程中，青岛的工人阶级——特别是码头、铁路工人成了德国殖民者最早欺压剥削的对象，当时德国人要码头工人干活，总是先找包工头，于是

注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4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包工头就乘机肆意克扣，往往原包工价每人每天5角，经包工头一扣，落到工人手里时只剩2角了。再是包工头还利用各种方式敲诈勒索工人，名目之多，手段之毒，令人发指。正象工人说的：“被逼走进（包工头的）赌局门，休想带钱回！”另外，当时德国殖民者以日耳曼“优秀”民族自居，骑在码头工人头上，为非作恶，极尽仇视、侮辱、谩骂、迫害之能事。曾在小港水师工务局当过钳工的老工人富裕功，回忆起德国监工迫害中国工人的情景时，面带怒色地说：“那时德国监工对待中国码头工人真熊！张口骂，动手打。我们车间那个黄毛鬼，整天在工人面前转，爱打谁就打谁，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獾’。单我们车间，就先后被他打跑了6个。有天，下班前几分钟，我干完了活正在洗手，‘獾’从我后面走过来，无缘无故打了我一耳光，那种日子简直没法活下去。”当时的情况是“只许他打人，不准你还手”。这还不够，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德国人还在码头私设刑堂，加强警特统治，看到哪个工人“不顺眼”，就抓进去非刑吊打一顿。当时码头工人把这种悲惨遭遇，叫做“进黑房子”。德国殖民者对于铁路工人的虐待也是非常残酷的。据德寇统治时期的老工人回忆，当时铁路工人的工资一般每人每月只有六至七元“德华票子”，而对中国工人的任意打骂更是常事。

这时工人在数量上虽然还很少，但却是最革命的并且有远大前途的新兴的劳动阶级。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因而不能有组织地反抗德国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工人并不是没有反抗的，他们以消极怠工、不辞而逃、合伙逃逸、拿取物资来对付德国殖民者。

这样自发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强盗乘机由德寇手中攫取青岛，于是灾难深重的青岛工人又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日寇侵占青岛后，除沿用德寇已修成的海港和胶济铁路，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外，还利用山东富饶的资源，办工厂，开矿山，大肆掠夺。在为时八年内，先后建立了六个纺织工厂：于1916年设立了内外棉工厂（现在国棉二厂），1919年设立了大日本纺织工厂（即大康纱厂，现在国棉一厂），1921年设立了宝来（现在并入国棉九厂）、富士纱厂（现在国棉七厂），1922年设立了长崎纺织工厂（即隆兴纱厂，现在国棉三厂）及钟渊纱厂（现在国棉六厂），拥有纱锭239,560枚，其中大康、钟渊两厂并有布机1021台。据日本人自己统计：仅这六个纱厂共投资157,880,000元，雇用职工14,311人。此外，尚有青岛制粉公司、青岛磷寸（火柴）公司、山东火柴厂、东洋制油公司、东和公司（油厂）、蜂村洋行（油厂）、三井油坊、三菱油坊、孤山窑厂、铃木丝厂等工厂。到1923年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成立前夕，全市产业工人总数达25,000余人。

1922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被迫交还了青岛，但仍保持在华投资的特权，继续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开设工厂。自1923年至1926年又新建了福星面粉公司、华祥磷寸公司等厂。1925年英国也在青岛开办了大英烟草公司等厂。东西方强盗们就这样在华享受着投资的特权，残酷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又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

的资本主义发展。”①据青岛已有的记载：从1920年特别是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如1920年建立了华新纱厂（当时有工人2500人，即现在的国棉九厂），1923年建立了恒兴第二面粉厂等。除了这些较大型的民族工业外，还发展了许多小型的带有手工业性质的工厂、作坊，如长兴织布厂、大纶袜厂、兴业织袜厂、通盛公袜厂、协成花边厂、明华火柴公司、益合祥油坊、玉兴成油坊、大兴制革厂、德春制革厂等。这些民族工业大都资金微薄，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不能与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相竞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当时直接垄断操纵了青岛的经济命脉，严重地束缚着青岛民族工业的发展。

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日英帝国主义在青岛工厂的兴建与增加，青岛产业工人阶级获得了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全市产业工人的总数已达34,000人。

青岛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全国工人阶级一样，它是一个全新的劳动阶级，不但和那些与落后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劳动农民不同，而且与中国现代大工业出现以前的各种手工业工人不同。它是一个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先进阶级。

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青岛的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而所得的工资是微少的。工人的生活没有起码的保障，并且在中外工厂中，还曾存在封建把头制、学徒制、包身工、养成工等超经济剥削，

注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85页。

厂主、把头任意打骂工人，克扣工资，工人和奴隶一样连人身自由都没有。青岛工人阶级因为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除了具有一般的无产阶级基本优点外，还有其特殊的特点，即具有特别强烈的反帝思想，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它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坚决、更彻底、更革命。又由于所受压迫与剥削的深重，这就要求中国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求得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才有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青岛工人阶级大部分来自即墨、胶县、高密、日照一带的破产农民，它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在斗争中相互支援。

另外，青岛工人阶级的数量虽然不多，但集中的程度却很高，大部分是在六个日本纱厂、一个中国纱厂、海港码头、四方机厂和铁路等几处，这为他们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四方机厂工运的初潮

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初期是一种自发性的斗争。但就在这些自发性的斗争中，也基本上反映了这个新生阶级的特点，反映出它的组织性、纪律性、表现出它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以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就以自觉的姿态，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雄伟气魄，投入了为中国的独立、解放的斗争。

四方机厂工人在帝国主义者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榨下，忍无可忍，早在1919年就进行过斗争。当时工人由于长时间没有增加工资，而物价又逐步上涨，逼得大家非起来反抗不

可；另一方面，他们很早就感觉到工资不合理，同样技术水平的日本工人的工资比中国工人高出二至五倍。因此，在一部分工人中就开始酝酿罢工请愿，人们互相交换着意见，商量着罢工的条件。但是刚刚酝酿，就被日本厂长船田知道了。这家伙采取镇压的手段，把为首的工人开除了。但是压迫愈紧，反抗愈烈，工人们仍在酝酿着罢工。以后船田看着不妙，在工人的压力下，迫不得已给每个工人加了一点工资。通过这次斗争，却为以后成立“圣诞会”的斗争创造了条件。

1922年12月10日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全市人民奔走相告，兴高彩烈。四方机厂的工人也纷纷议论着：“今后给中国人干活，可该喘口气了。”可是这种喜悦和希望，很快成为泡影。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政府派来的胶济铁路管理局长赵德三（字蓝田），带来了一大批私人亲信，整个铁路系统用人“唯亲”，工厂里充满着封建衙门的腐朽气息。而过去的监工、把头还照样当领班，任意打骂工人。加之每天12小时的繁重劳动，工伤死亡的威胁，微薄的工资，非人的待遇，失业的痛苦，尤其是政治上的不自由，并没有丝毫改善。甚至把日寇统治时期，工人经过多年斗争争来的年终奖金、春节休息三天工资照发，每人每年一张免费火车票等待遇也取消了。因而引起工人的极大愤怒，展开了斗争。

原来在中国民间手工业有一种传说：铁匠的祖师是老君，木匠的祖师是鲁班，油漆匠的祖师是葛贤翁。每个祖师都有生日，到了祖师生日这一天，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出钱，唱唱戏，吃吃酒，大家娱乐一番，实际上借此联络感情，巩固组织，带有狭隘的行会观念。四方机厂有铁工、木工、油漆工等。钳工郭恒祥就利用这个旧的形式，把四方机厂工人

大部分组织起来，取名“圣诞会”。会章第一条：崇敬祖师，第二条：互敬互助等。推选郭恒祥为会长，张吉祥为副会长，郭学濂、耿华山为评议长。并规定：每人每年捐献一天工资作为平时活动经费，除用于每年旧历2月15日唱戏敬祖开支以外，余则作为工人临时救济用。“圣诞会”成立后，由于维护工人的利益，逐渐成为工人的依靠，不论谁有什么困难或工人和领班有什么纠纷，也都提到评议会去解决。

凡加入“圣诞会”的每人发银质牌一枚，披戴胸前。1922年2月15日那天，“圣诞会”第一次唱戏敬祖，工人锣鼓喧天地热闹了几夭。

“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全国铁路工运转入秘密活动，组成了五路联合会（京汉、粤汉、津浦、正太、道清五条铁路的工运组织，1924年2月更名为全国铁路总工会）。该会得知青岛四方机厂成立了“圣诞会”，就秘密派王荷波同志（津浦铁路工人，1922年在浦口组织工人俱乐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925年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同年11月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来四方机厂与“圣诞会”郭恒祥联系，“圣诞会”就加入了“五路联合会”。王荷波同志对郭恒祥等人进行了政治教育，指出“圣诞会”扎神棚，供神像是迷信思想；但又指出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只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就好，不要光化工人的钱，要为工人多办些事情。王荷波同志又向郭恒祥、张吉祥、耿华山等人讲道：“现在你们组织‘圣诞会’，里面有铁匠、木匠、油漆匠，行不同心同，好比三兄四弟，应当抱成个团体，拧成一股绳，这就叫做团结。你们制会章、戴牌子、唱戏都

可以，这能壮大工人的声势，可是一千条一万条，别忘了为工人兄弟办事。其他城市的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你们成立了‘圣诞会’，不管名目如何，都应当为工人谋利益，和统治者抗争。”

郭恒祥等人定睛地望着王荷波同志亲切的脸庞，沉思着他意味深长的话语，好似在炎热的伏天里，逢到甘霖，头脑骤然清醒起来。“圣诞会”在王荷波同志的领导与推动下，印发了《四方机厂工人俱乐部简章》，主要内容是：工人团结互助，互相友爱，互相交流学习技术等十条。同时，组织工人演戏，成立了图书室，并准备办夜校（后因条件限制未办成），特别是为工人受压迫进行了一些反抗活动。从此，“圣诞会”便由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行会组织，逐渐变为争取工人政治权利的政治性组织了。不久，王荷波同志就离开了青岛。

1923年春，“圣诞会”发动全厂工人向厂长要求每人发给一套布料制服，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但在工人的威逼之下，原来准备发给课长、领班的袖口绣着金线的呢料制服，也被迫取消了。这是第一次灭了领班们的威风，增长了工人們的斗志。

1923年秋一天中午，木工纪子贞突患中风死亡，郭恒祥以“圣诞会”名义向厂方要求做具棺材装殓死者。厂长杨毅摇头晃脑地说：“此例难开”。但在工人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允许了，并与管理局交涉拨给一个车皮把灵柩运回胶县原籍。在灵柩起运之前，工人们还在四方开了个追悼会。经过这次事件，“圣诞会”在工人中树立了威信，工人都把“圣诞会”当成自己的组织，不论有什么事都找“圣诞会”

解决。

接着，“圣诞会”为了工人的利益向领班作过一次斗争。缘北洋军阀政府接管四方机厂后，听信日本人的话，任用了一批领班，对这些人给予特殊优待，借以分化工人。工人对这些人非常不满。象锻冶场（即车间）的领班杜文福，经常打骂工人，工人们憎恨他，就向郭恒祥作了汇报。将杜叫到“圣诞会”，逼他跪在老君像前，严加申斥，并警告他此后不准打骂工人，在场的工人也跟着斥责了一顿，杜当众表示悔过，从此再也不敢欺压工人了。

这时厂方看到“圣诞会”把工人组织起来了，非常恐惧，就想设法破坏“圣诞会”。1924年2月中旬一天早晨，客车场来了几个厂长的腿子，借口丢了三块帆布围裙，要进行搜查。不一会儿，他们扬声说：“哎！在这个工具箱里搜出来了。看！三块新帆布围裙。”

他们还煞有介事地叫嚷：“嘿嘿！一天干不了多少活，拿着工钱不算，还偷起来了！”“妈的！把姓刘的找来！盗取国家财产，还有王法没有？”

听到吆喝，铆工刘凤祥走过来了。理直气壮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凭什么诬赖人？我活这么大学，也没做过一点亏心事……”。

那几个家伙色厉内荏地说：“捉贼拿脏，脏证摆在这里，还狡赖！送厂长室处理！”

在旁边的徒工说：“噢！刘师傅工具箱里怎么会有这个？你们没来以前不大一会儿，我到他工具箱里找镙头，还没见着哩！”这时，工人群里的乔风九想，勤劳老实的刘凤祥不会干这样事，这分明是有意地栽赃。不由怒火三丈，一步跨